

伏地爬行攀摘硕果

——见证杜光辉的文学人生

文/刘元举



陈忠实与杜光辉在海南



泰文作者刘元举与杜光辉在海南

开,我和有十年以书信神交的杜光辉见面了。会议期间,我们天天在一起畅谈,他跟我聊青藏高原、可可西里、藏羚羊、汽车兵……
我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,他拥有这么多得天独厚生活和创作素材,文学前途不可限量。会议期间,几个大刊的编辑向他约稿,尽快把可可西里写出来。但是,他一直按兵未动。
时光进入1992年底,杜光辉突然和我失去了联系。我通过多方打听,才知道他携妻带女去了海南,而且在海南流浪、困苦潦倒,几成盲流。我深知杜光辉的创作才刚刚开始曙光,不该抛离优渥的铁路作家的创作条件,冒然去闯荡海南,这是多么重大的失误。他不适应海南,他与海南的氛围格格不入。假设他不去海南,他的可可西里系列小说早就问世了,还会有更多沉重厚实作品。他无需再充填海南的生活,现有的素材够他写一辈子。
两年后,我接到他两万多字的纪实散文《闯荡海南,精彩与无奈的世界》。知晓了他在海南曾经流浪街头,他和妻子小郑一天只有两碗汤粉,小郑还要把粥的拨到他碗里,他夜里还要写作;知晓了他在酷热的季节,没有钱买矿泉水,跑到酒店的卫生间装成解手,喝不掏钱的自来水;知晓了他在台风暴雨里,骑着单车带着小郑跑广告,马路上的积水淹没了膝盖,稍不小心就会坠入下水道;知晓了他低三下四地求职,被老板毫不客气地驱赶,作家的斯文扫地……
那段时间,我为他的生存担忧,更关注他的创作,每期的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,都有全国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目录。令我欣慰的是海南的残酷没有毁灭他,这个曾经转战青藏高原的军人,困守大巴山的铁路汉子,骨子里的刚硬、坚韧,使他坚持下来了。他的作品喷发似地朝外冒,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了他的《商道》《白柳子》《公司》《连续报道的背后》《证人》《哦·我的可可西里》等近十部中篇,《小说月报》转发了他的中篇小说《赌徒和他的婆娘》《教师节》、长篇小说《可可西里狼》,还有《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转载了他的四五部中篇小说。这样的创作成就就是放在全国文学创作的格局中,也是位于前列的作家之一。
2000年底,杜光辉终于在海南站稳了脚跟,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,他第一时间就邀请我到海南。

四

二十年了,一个编辑与一位作家,同龄的我们,坐在他闯荡海南,历尽沧桑苦难才刚刚拥有的家中。

编辑搀扶着我的肩膀一步一步挣扎,我一生都要感谢他们!”
我又一次被他的行为震惊了。我做了几十年编辑,不知写了多少退稿信,联系了多少作者,然而,又有谁保存了这些退稿信?并且在如此贫困艰辛的流浪途中,他丢弃的全是生活必需品呀!那一刻,我突然有种从事文学编辑的成就感!那些个海南之夜,是我们俩人的青藏高原之夜。杜光辉跟我讲他的青藏高原、可可西里,我跟他讲我闯荡黄河源的经历。
1988年的春天,我孤身走向黄河源头,走向扎陵湖、鄂陵湖,走向黄河源的经历,如何与苍鹰对语,与苍狼对峙,一步一步走近死亡,又一步一步地走出死亡的历程。正是那一次难忘的黄河源历险,和几年后的数次深入柴达木石油人生活,我写出了散文集《西部生命》。这部散文集深得杜光辉的喜爱,他给我打电话,他在多次大学讲坛上以此书为引,启发学生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神性散文写作及生命体悟的思考。他在讲散文创作中特别讲道:“刘元举是用生命的危机写出的《西部生命》!”
我的黄河源与柴达木游历,让我激情写出中篇报告文学《黄河悲歌》(获首届“中国潮”全国报告文学奖)、《求索黄河源》(获《青年文学》年度散文奖),以及《西部生命》,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提名、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散文奖、第二届东北文学奖、首届冰心散文奖等多个奖项。
我与杜光辉共同的高原体验,共同的高原题材探索,共同的以生命付诸文学的写作,让我们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默契。我们已经不再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,成了心心相印的好朋友。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当他离开大巴山走向海南时,我也离开沈阳城走到了岭南的东莞和深圳。直到如今,他仍然在海南居住,我仍然在深圳安居。
五
大概是2004年,杜光辉打来电话,告诉我他调到五指山区的大学,这所大学远离闹市,远离喧嚣,能静心写东西。对于他的新变动,我喜忧参半,喜的是大学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写作,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忧的是他是以生活阅历为创作素材的作家,大学教授是以理论为本钱的关系,两者是平行的钢轨,很难重叠到一块。这对于他来说,无疑又是一个新的考验。
所幸的是他到了大学,又一次爆发了创作高潮,写出了著名文学评论家王达敏认为的“高原三部曲”《可可西里狼》《大车帮》《大高原》,还有他闯荡海南为素材的长篇小说《闯海南》及几十部中篇。他的长篇小说《大车帮》、中篇小说《陈皮理气》、短篇小说《洗车场》,先后进入中国小说排行榜,其中中篇小说《陈皮理气》入选《全国本科教材·现当代文学》。
近年来,我和杜光辉的作品数次在《北京文学·精彩阅读》上会面,去年我的中篇纪实与他的中篇小说出现在同一期上。从《北京文学》上,我读到杜光辉的万字散文《六月的焦灼与千年的凄苦》、《读书·谋善的基座》等篇什,明显感觉他的写作风格和作品内涵发生了变化,他实现了自我超越,转向了学者型写作。
两年前,我再次到海南,杜光辉给我说,他授课课程是《文艺心理学》《西方文论》、公修课《小说创作与欣赏》。他以作家创作实践的经验审读普遍使用的教材,感觉有一些空洞、错误的地方。他就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,自己编写教材,很受学生欢迎,在学校多次对老师教学的评定中名列前茅,海南省教育厅还把他撰写的《文学创作与欣赏》评为线上精品课程。
杜光辉的转型非常成功,是一次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,他的大脑到底比我们多些什么?
杜光辉回答了我的疑问,他这些年的阅读量,每年最少1500万字,有时达2000万字,就是写长篇小说,阅读量都不允许降下来!
在我伏案撰写这篇文章时,查了他的创作清单,竟然发表了850万字的作品,有5部长篇小说,81部中篇小说,被转载了30部,39部短篇小说,100多篇散文,还有大量的时评、经济随笔等。这样的作品量和转载率,对于和杜光辉同时代写作的作家而言,又有几人能做得得到呢?
杜光辉邀我写这篇文章说:“我的成名作《车帮》是您编发的,二次创作的飞跃《哦·我的可可西里》是您推荐给《小说界》发表的,第三次飞跃是您把我介绍给《北京文学》的,您见证了我四十年的创作!”
我认为,他说的这些肯定是重要因素,但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真诚。他为文为人的真诚,唯真心而感动天地!
本文首发于《中华英才》杂志。作者刘元举,历任《鸭绿江》文学月刊社长兼主编、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。曾为浙江理工大学、沈阳建筑大学兼职教授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、辽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国家一级作家、编审、深圳交响乐团驻团艺术家。

“科幻模糊了国家民族边界,是最能引起不同国家、不同文化背景读者共鸣的文学类型。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中国科幻作品翻译成英语、日语等语种在海外传播,世界对中国科幻的了解比以前多了许多。”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。
23日在重庆落幕的2021儿童科幻大会和第十二届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礼,因刘慈欣的出席而受到科幻迷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。
2015年,刘慈欣的科幻小说《三体》斩获世界性科幻大奖“雨果奖”,随后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西等十多种语言在全球热销,带动中国科幻“破冰”出海。6年间,更多优秀的国产科幻作品相继问世,出版、影视、游戏等相关产业迎来发展的春天。
而刘慈欣的态度一如既往地积极而审慎:“不论是科幻文学还是影视,当下最重要的仍是加强科幻原创内容的创作。中国科幻应抓紧加强整体创作水平,向世界展示更多优秀作品。”
“科幻与技术发展、时代发展关系密切。你必须在科幻小说中表现那些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,而不是只表现本民族本国家关心的问题。”刘慈欣说,与之前的创作相比,近年来的科幻作品更多地关注起虚拟现实、人工智能等改变人们生活的技术,探讨技术和人、和社会的关系。
针对国产科幻影视的发展,刘慈欣表示,除了要创作更多有影响力的科幻文学IP,还需在创意上进一步加强。刘慈欣说,科幻影视是一个创意密集型项目,创意一部分来自电影本身的特效制作,另外一部分则来自电影所讲述的故事。
他认为,现在国内科幻影视存在重特效轻剧本的倾向,这是本末倒置,“一个真正好的故事,即使没有一流特效,也可以获得成功。”
好的剧本离不开好的编剧,因此,本土专业人才培养也极为迫切。“和科幻作家相比,科幻编剧更稀缺。之所以目前国内科幻影视大部分是IP改编,缺少原创剧本,正是因为缺少熟悉科幻的专职编剧。”刘慈欣说。
值得一提的是,近两年,刘慈欣和科幻界开始将目光转向“给孩子看的科幻”。他认为,少年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,正是科幻文学的精神内核和魅力源泉。
2021儿童科幻大会上,刘慈欣以少儿科幻星云奖组委会主席的身份亮相,为一批获奖的优秀国产儿童科幻作品颁奖。
“随着时代的发展,少儿时代读过的科学幻想会变得越来越真切。与童话和其他幻想文学相比,科幻对小读者的未来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。”他希望,能吸引更多作者投身优秀少儿科幻创作,让更多孩子爱上科幻,为中国科幻未来整体发展打下基础。

中国科幻呼唤更多更好原创内容
专访科幻作家刘慈欣
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吴燕霞 赵宇飞



白云之上 张金江 作

说起我与杜光辉的相识,话就长了。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是《鸭绿江》杂志社小说组的编辑,每天从全国各地飞往编辑部的稿件有六七麻袋,统称为自然来稿。我分管西北片的稿件,陕西的重点作者有:杜鹏程、王汶石、李若冰、陈忠实、李天芳、路遥、贾平凹、邹志安、京夫、王蓬、晓雷、峭石、杨争光等,根本没有杜光辉的名字。
突然有一天,自然来稿中蹦出了杜光辉这个名字。那是一部两万多字的小,三百字的稿纸,每一个方格都用近乎仿宋体填充。抄错的字没有随意涂抹,而是用刮胡刀片把方格刮下来,在背后补上稿纸,再把正确的字填上。这种对文学的虔诚、认真和对编辑的尊敬,细腻入微地展现开来。就凭这种态度,我认可了这位作者,于是,给他写了回信,指出小说存在的问题和如何修改。杜光辉接到这封手写的退稿信,对他来说是多么巨大的鼓舞。一般情况下在退稿中的大都是印刷的退稿签。我的这封信唤起了杜光辉更高的创作热情,也建立了我们彼此的信任。从此,他一发不可收拾地把一篇篇小说寄来,我也会立即阅读。读出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——大巴山亘古不变的寂寞,道枕和钢轨的刚硬,深山小火车的孤零、简陋的铁路工房、不堪忍受的生活空寂。尽管他的文字还嫌粗糙,写作技巧上还有诸多不足,但他喷发的生活积淀,让我看到了杜光辉写小说的天赋,我判定,他一旦克服了技巧上的缺陷,必将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。
经过几十次通信,他的小说《流星》终于刊发,那是刊发在1983年的《鸭绿江》。我记得随后还编发了他另一部中篇小说《球道》。
二
杜光辉应该是那时候创作条件最艰苦的作者之一。他在一个叫毛坝坎的小火车站当通讯工,站台都修在桥上,一间堆放扫帚的楼间,仅能支张桌子,开门还要把椅子搬到桌子上。困了,就倒在铺在地上的木板上睡一觉,醒了,就接着看书写作,或者上山查线。这个楼梯间住人都难,何况在里面写作。
他吃饭穿衣都不讲究,却对钢笔稿纸特别挑剔,小火车站买不到方格稿纸,他就跑到几百里外的万源县印刷厂去订制。人家说够三百元的业务量才开机,他就借了三百元钱。他每月工资四十一元,一年没有吃肉,才还完这笔借款。一次上山检查通讯线路时,昏倒在山上,工友将他背到十几里外的卫生所,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所致。
那时的文学刊物大多刚刚复刊,供不应求,他就到客车上买文化下乡的杂志。杂志买到了,火车开走了,他只好沿着铁道步行近二十公里回到住处,中间要经过三四个千米以上的隧洞,在隧洞里遭遇火车,是多么危险的事情。
一个无论身体、文化都和大家一样,甚至还不如人家的人,竟异想天开地想当作家,自然被人视为另类而嘲笑。甚至有工友说:“杜光辉,你要是能当上作家,我让你裤裆下钻三圈!”
我后来在《天涯》读到他的散文《那个读书如罪的时代》:“上班攀山查线、下班看书写作,成了我的主流生活。我的阅读向更深更广的范畴延伸,触及到哲学、社会学,甚至绘画、建筑等方面。我读了《理想国》《论自然》《古兰经》《人性论》《存在与时间》《圣经》《逻辑学》《文化的科学》《学术的进步》,还有《神曲》《十日谈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猎人日记》《安娜·卡列丽娜》《复活》《红楼梦》等。”
杜光辉还写道:“我像久旱的沙漠,遇到春雨的滋润,一滴不漏地吸收;也像有生以来都处在饥饿状态,猛然遇到丰盛大餐,拼命警饕。那些年的阅读,为我的文学创作,为我以后到大学教书,奠定了非常厚实的基础。”
1990年初,我接到杜光辉的来信,说他写了部中篇小说《车帮》,北京一家大刊给他的退稿信中写道:“杜光辉同志,你用了个最陈旧的手法,写了个最陈旧的故事……”他把这部小说压了三个多月,不敢再投,想让我鉴定一下小说的质量。
我接到后,一口气读完三万多字的《车帮》,拍案叫好。《车帮》迅速在编辑部传阅,我很快给杜光辉回信:“……你给我刊写了一部近年来难得的好小说!”我编发了他的《车帮》,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,这部小说就是他的成名作。
随之,杜光辉的创作如山洪爆发,我又编发了他的中篇小说《黄帽》《驴道》《孤舟》,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了他的《医道》,《小说月报》转载了他的短篇小说《浪滩的女人》。杜光辉这个名字也进入了我们杂志社掌握的陕西重点作家的名单中,他在强大的“陕军”中拥有了一席之地。
后来,他跟我说,《车帮》发表以前,已经收到两百多封退稿信,他离开大巴山到海南时,妻子把他写的废稿卖给收破烂的,装了俩担子。他看着四筐废稿,流着眼泪说:“《车帮》就是用这些废稿堆出来的!”

三

1991年,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召